

第七章 生平第一次的大谎言

宝鸡初中三年，若问我学到了什么，我还真地回答不出来，因为心思实在没有花在功课上。

足以分心的事太多，例如躲警报的郊游，看枪毙人时，每次死刑犯游街前的反应都不一样，回来可以和同学们谈论很久。另外还有话剧，一出话剧总要回味好几天。但真正吸引我的是小说，这，便得要感谢张贤政。

和凤翔时一样，后几排同学是年纪大并有结了婚的，是四周乡下进城躲壮丁的当地人，前几排和最前排的女生都是外省人，外省人才和我的年龄仿佛，也才能玩到一块，这其中来往最密切的是张贤政。他算是我们同学中最幸运的一位，他爸爸好像是县政府的主任秘书，和我一样，特别爱看「闲书」，简直把学校的功课没放在心里。

我们那时看小说不是想看什么书便去找什么书来看，而是有什么书到手了便看什么书。张贤政看书奇快，来源又多，他看完之后给我看，多半时候要限制何时看完，他才好去换下一本。我们也看过鲁迅的「彷徨」和「呐喊」等，但大部份为章回小说，张恨水是民国初年的作家，他用章回小说形式写的「春明外史」我们也看过，故事中的一位记者是个麻子，且总是神经兮兮的，同事们给他绰号叫「神经麻痹」，以

上情节至今还记着，倒是后来看的「八十一梦」乃张恨水在重庆时的作品，反而印象模糊了。我们也看过一本某杂志征文比赛作品选集叫「天才梦」，据后来在台湾流行的张爱玲热中的杂文中说，那本选集的首奖「天才梦」是张爱玲写的，我的印象不深，「天才梦」中另一篇没获首奖的作品，故事印象深，但不记得标题了。再另外应是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等书了，当时人们忙于抗战，无名氏的小说也算是清凉剂。

由于看了乱七八糟的小说，如今觉得我在宝鸡三年读的不是初中，而是社会大学。民国三十三年夏季，我就初中毕业了，父亲早就说过，不但要读高中，而且希望我读大学，他尝过学历不足之苦，不忍让他的独子再如此。但是快毕业时，父亲反而没提这事。

我自己磋磨考高中的事，宝鸡市没有高中，远在甘肃省的天水县有一个国立中学，离宝鸡很远，且人家什么时候招生，和一切信息均无。到西安住在舅舅家里，选择高中去考是最明智的方式，而我有信心，即使是花费舅舅的钱念高中，舅舅也出得起，且十分愿意，然则，父亲竟绝口未提舅舅二字。

现在，我深深体会到信息的重要，有人把人类懂得用火做为人类文明史的第一波，第二次是工业革命，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有土斯有财」，不知道需要大量资金的汇合，才能办大事情。最近大陆的领

导才公开说：「让一部份人先富有起来。」此话确否，有待商榷。第三波的人类文明大突破便是信息了，未来的社会不再以土地、资金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知识和信息。

民国三十三年夏季，若是没有张贤政提供的信息，我可能无缘读高中，那，会怎样发展？我也不知道。

暑假后约十几天，张贤政来找我，说是要去西安考一个叫做「辅导处」的高中。我没听说过这个学校，我父亲也没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我们都相信张贤政的「信息」不会错。因而给了我盘缠，临行时，大约和我妈也商量多次，犹豫一下才把我舅舅在西安的地址写给了我，我就带着有限的一点钱和舅舅的地址，和张贤政一块买火车票去西安了。至今我理会到了当年父亲的心境，和他难以启齿的不得已，还无法让自己的心不疼不痛，可怜天下父母心，当时父亲并不知道舅舅处境，以及发生在舅妈身上的悲剧，等我到了西安才知道真相。我猜想为我投考高中的事，父亲一定曾经写过信给舅舅，但直到我启程赴西安时，一定都没有收到舅舅的回信，说不定，父亲写去的信可能不止一封。

遵照父亲的指示，我们到西安后没有直接去找舅舅，而是在南大街上住进一家小旅店。西安，那时尚无兵马俑，不是无，而是尚埋在地底下。南大街上回民甚多，现在他们改称他们为伊斯兰了。回民，

汉民很容易分别，回民眼窝深、鼻梁高、胡须浓，且多半经营牛羊肉饮食业，不到西此，不知道中国的民族犹如美国的欧裔、非裔、亚裔等，是很容易分辨的。

所谓「投考高中」一事，原来出乎意料之外的简单，此，得先叙述我来才知道的「时代背景」。民国三十二年年底，抗战已经进入第六年，日本被中国战场拖得太久，在面临美军在海洋上的重大压力之前，想一举先解决中国这个「頼皮缠」，中国，炸、炸了不还手，打、打了也不正式打，只凭「游击队」放冷箭，降呢？也不降。所以想双管齐下一举解决中国问题，双管的意思是兵分两路，南路占桂林，经贵阳向重庆挺进，北路则占洛阳经潼关，向西安挺进。这次中国大撤退的惨状，到台湾后看过某位作者对南路的回忆，情况确实狼狈，也看过黑白的新闻记录片，国家地理频道有个介绍中国女人缠小脚的专题片，还 insert 一段桂林大撤退时，人、车拥塞的道中，一个缠了小脚的妇女在地上爬行的惨状。北路日本轻易地就占了洛阳，在潼关才遇到了真正的抵抗，日本军队没有得到南路的重庆和北路的西安。日军想，占了重庆和西安，中国实在等于是消失了，实际上并不是他所占的地方不够多不够大，而是他们的人力实在太有限，东三省，北平、天津、青岛、上海、长沙、广州、汉口全都被他们占了，但只能说占的只算是「样版」，一出城全是游击队的天下，游击队有一些是

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讨便宜的，但大部份是共产党组织的，包括远至海南岛中央五指山的游击队，那时海南岛也在日本人占领中。胜利以后，美军派飞机运送国民党接收大员至各大城市受降，也一如日本军占领的情形，乡村的共产党游击队仍继续活动。

洛阳是河南省西部未被日本占领的重要城市，一下子撤退了，自然有许多公务员、学生和平民逃向西安。南边桂林的流亡学生政府怎样处置的，我不清楚，北边的则受政府重视，基本原因是陕西省北部的延安政府，也在大力吸收知识青年。我就在这个夹缝之中，获得了高中读书，且为纯粹免费的。

有人说他自己一生之中从不说谎，也许小谎不说，只说大谎也有可能，华盛顿在砍了樱桃树的小事上说了实话，谁知道他后来说了大谎没有。接着要说的是我这一辈子说的第一次大谎。

我跟张贤政按地址去见了一位张贤政父执辈的先生，姓鲁，他已预知我们两人要去，因此立即从抽屜取出两张颜色发黄的土纸，约比一张六百字的稿纸小了一圈，让我们各自在另一张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姓名、籍贯、年龄，他则照式分别填在那两张黄色纸张上。说：「收好，别弄丢了，你们到南院门的辅导处报到就成了。」我还想问要考试吗？考那几科等，张贤政拦阻我说，听鲁伯伯的话做就是了。临出门，那位鲁伯伯又叮嘱说：「如果你们带的钱够用，可以先玩两天再

去报到，西安可是比你们宝鸡热闹多了。」

出了门，我立即从张贤政手中拿过黄土纸看，上面写着：

肄业证书

学生冯鹏年北平市人，现年十七岁，肄业于本校高中部一年级，
因故休学

特此给予证明

校长

洛阳市西宫第二中学高中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月 日

说来惭愧，我至今都尚未去过洛阳，也曾想去看那儿每年四、五月间盛开的牡丹，皆因无缘错失了，但却算是洛阳第二中学的高中肄业生。

既然不急着考试或报到，那第一件重要的事当然是去找我舅舅和舅妈。张贤政是安徽人，家里很少吃面食，我告诉张贤政准备下空肚子，等着吃我舅妈的饺子好了。舅妈手脚快，又喜欢做饺子，剁馅捍皮不一会就下锅了。谁知我们找到了地址，竟无人应门，打听了半天，有位邻居知道我是他们的外甥，才又继续追问其它邻居，后来了给我们一个地址，是在西大街很偏僻的一条巷子，在我的坚持下，张贤政才肯放弃西安的电影，陪着我去的。

原来是一所医院，和如今的「医院」两字的外观与内涵定全不同，是一排长长的房子，分隔成很多间，反而类似于疗养院。舅舅和舅妈的地址是其中的一个门的门牌，距离到的门牌还有好几间，我就听见舅妈的声音了：「走！走！走！还守着我干么？我又不会生孩子！」

到了房门前，门大开着，果然是舅舅和舅妈，里面是个大坑，其它，似乎什么也没。舅妈蓬头散发地，眼睛里满布红丝坐在坑上，舅舅坐在坑沿，看到我们出现，舅舅急忙站起引我们到院中，显得有点尴尬地对我说，收到我爸爸前后两封来信，可是你看……用不着说，我全懂得了。

「舅妈怎么了？」我问。

「疯了。」

「那-----那大夫怎么说？」

「没有药，现在给点安神的，一点用也没有。」

里面传来舅妈的叫声：「是大年吧？大年这么高了，大年进来，让舅妈抱抱-----」不知怎地，舅妈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凄厉，接着她又半哭半嚎地叫：「生个大胖小子，多好啊，大胖小子啊！」

我把和张贤政来西安的目的和经过，报告给他。在我的一再推拒之下，舅舅还是塞了一把钱给我，挥挥手让我们走吧。一时之间我又犯了失神的毛病，傻蠢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舅舅，尤其是舅妈，

向来是太近乎了，几乎跟我爸妈没什么两样，可是如今怎么会如此？张贤政也一定看出了我的窘态，他给我舅舅鞠了个躬，说谢谢，然后叫我也说谢谢，我像木头人般学张贤政的样子鞠躬并也说谢谢，张贤政拉着我向外走，临到大门口才想到回头看看舅舅，舅舅还站在原处，朝我们看。

我进入高中后不久，就接到来信知道舅妈去世了。

舅妈的事对我后来的阅读习惯有很大的影响，约为民国四十年初，我在空军总部图书馆借到一本朱光潜着的「变态心理学」，可能是从那本书上第一次看到佛洛伊德的名字，此后只要能到手的佛洛伊德和他的弟子荣格的书，我都会像饿汉贪食般地读完。难道说，当时为一九四四年，一位中国妇女生儿育女的压力真有那么沉重吗？此也不禁令我想到凤翔的周效栋，周效栋的亲生母亲，很可能是在她姐姐的哀求之下，才宁愿和姐姐共事一夫的吧。

民国七十九年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先到宝鸡给我父母亲上坟，带着妹妹给我的地址和电话到北京后，见到了我舅舅再婚后所生下的表弟，不但长得像极了舅舅，而且子承父业，表弟也以开汽车为职业，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吧。

我和张贤政到当时西安最热闹的商业区称为「南院门」，南院门好像是一个广场，三面都是高楼大厦的商业区，只有一面是大围墙围

着，大门有直挂的牌子，上面写：「战地失学青年辅导处」，进门一个大映壁写「礼义廉耻」四字。后面，就是我们要去的「学校」了。

里面的办事员穿着军服，看了我们的证件，小心地收到卷宗里，头也不抬地说：「那我就把你们编入高二吧。」并命我们去见班长，班长也是穿军服的，一见面就问：「吃了没？」我们每人拿到一个超大的馒头，到他指定的宿舍去。所谓的宿舍是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地面上铺满了麦草，墙角堆得更高，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聚在一起聊天，其它，真地什么也没有。

我和张贤政彼此相看一眼，都似乎在问，是学校吗？我拉他到角落低声地说：「看样子是被骗当兵了。」「绝不会！」张贤政立即回答：「鲁伯伯不是那样的人。」其后和房内其它人谈天，才知道这儿是临时收容所，真正的辅导处在凤翔。

约三、四天后，我们就由穿军服的班长率领，坐免费的火车，用徒步行军方式走到告别整整三年的凤翔县，再见凤翔，有一种亲切感，惜乎在虢镇的火车上未曾再见她。

第八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

再见凤翔时，城廓如故，依旧纯朴。

原来，辅导处就是原来军校的校址，那时一定是军校缩编，撤消了凤翔的分校，但校址没有还给凤翔师范，接着由军方办了青年辅导处。

我们辅导处，以后为说话方便，便称之为我们学校吧。我们学校的硬件规模还真是不小，有大约六、七排教室，并排地有六、七排宿舍，每一排可以住九十人，有教职员办公室，有校长室，有一排供单身老师住的房间，有大礼堂，有操场。伙食房相当壮观，好像有五、六或七、八个大灶，是烧麦草的，大院子中堆满了麦草。厕所则可以列入天下奇观之一，靠墙一长排露天的蹲式茅坑，在那米田共尚可回收做堆肥的时代，他们竟然想出了挖掘深井的方式处理，大便下去很久，听到「噗通」一声，想必落入了水中。因为茅坑深不可测，下雨，下雪灌入其中也不会溢出，此刻我才怀疑，它是否已经到达地下水的层面，因为凤翔县家家都有一口井，我们伙食房的水井离茅坑的「井群」更近，它们之间是否私通了，我不知道。唯一能挑剔的是学校没有餐厅，我们都是带小板凳围成十几个圈子，坐在地上吃饭。

入校后不久，我们高中部二年级生便集合在一起，每人发旧军服一套，铜制面盆一个，有些面盆尚可用，有些已经破裂。另每人小板凳一个，长方形木板一块，板子两端有一条捆绳，可以挂在脖子上，这是代用课桌，想来这一切均为以前军校学生留下来的。没有棉被等

物，我和张贤政都没带行李衣物，好在仍在暑假中，便和衣睡在坑上。吃，一天吃两餐，一在中午，一在下午五时许吧，没有早饭。每餐吃的都是「杠子馍」，我在伙房外看伙夫做过，有一捍称挂在他们面前，称锤是固定着的，要等面团放在称盘上，称铊和称盘才会摆平，多一点少一点都得加减面团，蒸出来的馒头一般大小，用不着挑拣。一开始每人一小碗豆芽，后来没有菜，只加点葱花成花卷，再后来连葱花也没有，只剩馒头了。

没多久，张贤政看此情景知道非久留之地，问我的意见，我回答他的是，他若找到高中可以读，花多少钱？怎么考？务必尽快告诉我，我则暂留下等开课之后看学些什么再说。那时，我们已经知道「开小差」这个名字了，张贤政决定开小差，我把身上舅舅给我以及剩下的钱全部给他，他非要留一半给我，坚持之下，我答应留下点买邮票、买车票的钱，其余的让他带着偷偷离开学校，离开凤翔，设法坐火车回到宝鸡，把有关我舅舅的情形，以及学校的情形禀报我的父母亲。约两个月后，持父亲来信为证，才能请假回宝鸡，带了被褥等物回到学校。

我和张贤政一直有书信往来，知道他去陕南读过高中，但根本未向我推荐。后来我到了四川旧市坝还有通信，之后退回了三、四封，旧市坝的同学们还开我玩笑：「人家女朋友懒得理你了，你还死缠着

不放。」他们也不看看信封上的名字，像女生吗？

我能够有高中可读，且为公费，真应该感谢张贤政，感谢他的信息，感谢他的鲁伯伯让我跳过高一直接念高二。他原本是借书给我的好同伴，后来却把学校也借给了我，这就是所谓的缘份吧。

进入高中后第一位好朋友是王福成，和我同班。我前后已在陕西住了七年，自然听得出陕西人的乡音，王福成虽然尽量说「普通话」，而我一听便知他是陕西人。我们独处时，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凤师附小毕业的，你呢？」此话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王福成毕业于凤翔县中，就是我考上但未去念的那个初中，因为凤翔再无高中了，他是由父亲托人进入辅导处的，因为听说这儿水平低，乃跳升高二。我要求星期假日去他们家吃哨子面，他一口答应，要求陪我去东关外竞存中学找周效栋时，他面有难色。

其实，几乎到凤翔的第二天，张贤政就陪我去周效栋他们家了，他们搬了家，我们大声地把寡妇房东呼喊出来，看样子她实在不知周家搬去何处。又去南街李英超家，天长商行还在，李英超他们也搬家了。王福成告诉我，竞存中学半夜里常常被军警冲进去抓人，我们辅导处穿了老虎皮(指军服)的人去，常常被打个鼻青脸肿，保不住没命了也很难说。

「为什么？」我问。

「他们都是共产党啊。」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名字，看来，我在宝鸡看了三年的小说，又自以为是社会大学的，是白花精神了。此时距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已经事隔九十六年，而距大陆的共产党把我们赶到台湾来，仅仅剩下五年了，后来知道竞存中学的创办人和校长车向忱(1898-1971)，是抗日胜利后的民国三十四年才去陕北正式参加他们，那时怕只是一个共产党主义的同情或崇拜者，类似车向忱这样的知识分子，当时中国很多很多，其后被国民党暗杀的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均属此类。

王福成又劝我，即便保证周效栋读了竞存中学，竞存没高中，周效栋也应毕业离校了。因此之故，大操场上我的失神大哭把他吓跑，就成为我们的最后一面。

我高中认识的第二个朋友是赵双桢，他自己一再解释他的名字是赵双「快」，不能念成双「会」，大概总是怕被人和卖国贼秦桢混在一起，他是河北省高阳县人，乃真正「流亡学生」，他们那些人都是先到一个叫做「界首」的三不管地带，再偷渡到大后方的，事隔多年，已记不清楚他的逃亡故事。他是在北平读了高中一年级，随身还带着一本「三角学」教科书，纸张比大后方的土纸好，在他的书和他的指导下，我把高中一年级必修的三角学弄了个半懂。

我们事实上和一般的高中没有太大分别，每天八节课，没有灯当然也没有晚自习。国文、历史、地理有老师讲课但无课本，得自己笔记。数学每人发了一本「范氏大代数」，课本是旧的，有的没封面，有的没封底，书很厚，老师也认真的教，但上课不点名，所以缺课的很多。英文老师叫赵嘉理，名字就显得洋气，上课时的第一句话都用英文问大家好，教得如何，学了什么，全无印象了。我和赵双桢最喜欢的是「三民主义」课，老师姓名全忘，我猜他是军校时代的老教官，上课时除了粉笔什么都不带，我们也无课本。他的第一堂课是由鸦片战争开始，等于三民主义只讲了一民，即「民族主义」，他对屡次列强入侵，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签了多少不平等条约等，倒背如流，把我们一群青年人煽动得义愤填胸，等说到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时，胸中的怒火几乎要爆炸了。赵双桢一再地说：「此仇不报非君子！」

不久，他就找到了报仇的机会。

民国三十三年底，蒋委员长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些日子真正是壮怀激烈。赵双桢在签名大会上用人家准备好的刀片划破手指，以鲜血签名，同学们蜂拥上台在白长布条上签名，有的呼着口号，有的热泪盈眶推挤向前。历练过那一激情年代的年轻人，我深信或多或少，或东或西在某一角

度会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包括我这个反对军人论者。

我们辅导处由于大部份同学都是逃亡出来的，从军的人很多，此事好像与凤翔县县长的年终考绩有关，县政府发了从军同学奖金。赵双桢还用此奖金请我在县府前的摊位上吃了荞麦和乐。当时「中国的命运」一书是否出版？我不记得了，我们吃完荞麦和乐回来的路上，谈了很多。我和周效栋之间的事对他说过，我发誓不当军人一事他也知道，似乎看出了我的愧怍之情，反而安慰我，可以努力读书，将来当上工程师，总得有人留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呀。

凤翔县政府雇用了许多辆用骡子拉的轿车，他们四人一辆乘车去虢镇。我一直尾随车后送他们出南门，跟着赵双桢的那辆车走，他也探身出来，他，我都哭了，他一再抽抽噎噎地叫着：

「回去吧！记着好好读书，回去吧……」

我执意继续跟着，一直到车速快到追不上了，犹站在原地看车子远去，远去。我们的泣别绝对比易水送别的场面更为热烈，更多热泪。

赵双桢他们没有机会碰到日本鬼子报仇，我们学校的同学都是先到昆明，再飞印度，接受汽车驾驰兵训练。我和他一直在通信，从他的来信中知道巧克力这个美味食品，等真正尝到巧克力才知道和五四时期作家所写的「朱古律」是同一回事，赵双桢信封上的印度邮票我珍藏多年。民国三十八年年初，我在广州时他已经接到退伍命令，来

信说要回老家，命我暂时不必回信，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南部的高阳县，早已在「共匪」手中，他怎么回去，令人费解。或许，他在服役青年军的五年之中，受了什么人的影响，也不知道。他没有来台湾。

那些岁月的日子从某一角度上看，算是「艰苦卓绝」，实际也是热情澎湃的，眼看着三十四年春天到了，想着，好快，暑假后就可以升高中三年级了，可惜我的高中三年级只读了一半。

第九章 他的烙印我的烙印

我们有一位同学姓阮，个子小小瘦瘦，两只眼角明显下垂，不知他是那一班的，只是每天两次吃杠子馍时才会出现。另一个他肯定会出现的时机是下雨的时候，雨越大他的声音也越大，原来他会疯狂地在校园中狂奔，并告诉大家：

「下儒了！下儒了！」

人家告诉我阮同学的故事。他是湖北人，湖北人把「雨」字读为「儒」音。他老家在湖北省长江沿岸的某县，有一天下了大雨，随即大水涨进家屋，随即家、村子、一望无际的土地都没有了。他飘了出来，漂到一棵老树梢上，他抓紧树枝，不记得撑了多久，大概到了几乎没有知觉的时候，才被救了下来。这个伤痕不知何时才能愈合，他

不断在校园里狂奔叫「下儒了，下儒了」，白天晚上都如此。得麻烦请队长们出来，强迫他到空的房间去，他关在里面，仍然在叫：「下儒了！下儒了！」

那天，我是说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中旬某日，我们正在课室里上课，远远又听见「下儒了！下儒了！」的叫声，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外面在下雨了。而惊叫声慢慢近了，听来不像是「下儒了」，更近一点，有一位同学满脸错愕地回头问我：「是胜利了？」呼叫的声音已经到了教室门口，那人推开门，向正在上课的姜老师和大家喊着：「胜利了！」

无论如何，对日抗战胜利这等大事，我还是认为值得一说。只是谈这等大事得费多少文字？难怪有人预测，未来可能无人要看小说了，和影像传播来比，用影像更有效率，只需给我三十秒，我可以用十个以上的镜头交待抗战胜利对大后方人的冲激，有笑容、有哀伤、有眼泪，「漫卷诗书喜欲狂」只需一秒三十就够了。

在凤翔那个小县份，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也很可观。大操场上连着三台秦腔大戏，除了原有的司令台外，另在东、西各搭一个临时的戏台，有三个秦腔剧团同时上演。我和王福成站在大操场中央，不知看那一台才好，王福成似乎比我成熟一些，他带我去看一辆一辆的骡车，当地人称为「轿车」，它们停下把骡子卸了，用长凳架在两根车辕之间，还真像一顶轿子。轿帘多半是垂下来的，轿帘中间挖空，讲

究点的还镶上玻璃。王福成特别让我看由轿帘下伸出的一双又一双的小脚，那可都是有钱人家的内眷，只有在这特别的场地，才会一下子有那么多有钱人的内眷出现，可惜只能看见她们的小脚，只能论足，无法品头。

我们学校有全凤翔县唯一的大礼堂，连演三天夜戏。那三天有两天是京戏，一天是河南坠子戏，通通是业余凑成，行头借自何处不清楚。凤翔没有电力，据说县长也来看戏了，大家都照样坐在昏暗中，要等到快开演了，才有人匆匆提两盏「汽灯」挂上。我在宝鸡连多幕的换景话剧都看过了，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地「盛大」。

有些同学开始整理行囊，好像就要启程回家，其实，铁路东边通到潼关没有问题，以后的陇海、平汉铁路是否通车，一无信息，倒是「共军流窜」，「共军阻碍我接收工作」等新闻接踵而至，同学们逐渐感到胜利的果实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甜美。父亲是由遥远的兰州来信告知我胜利之事，为了养家，父亲独自一人闯荡甘肃兰州，总是那方面有熟人才去的，去了是否挣得到养家的钱，信中没有告诉我，但是我知道，但凡日子过得舒坦些，父亲都会寄些小钱过来，那一次以及前两次来信，都没有附寄汇票。

八年抗战在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心上都烙了难以忘怀的伤痕，而对于我，似乎考验才刚刚开始。学校方面有了让我们感觉得到的变化，

教务长去了西安，一直到我离开未再见他回来。有两位老师走了，其中教物理的李老师原本就常常缺课，这一下索性不来了，这样不知过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发生了「松花江事件」，同学们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

「松花江事件」当然是我给 它起的名字。缘由那天下午晚餐时候，馒头没有送来，那时我们每天两个杠子馍，别无其它，喝水，也是喝从井里打上来的生水，但到时候大家仍会聚在一起，十人围成一圈，各自坐在小板凳上等待，伙夫抬馒头过来，每个盆中放十个，由一位同学端回去，大家一块吃。那天黄昏，大家等了很久馒头没抬过来，最先是一两人去伙房看，后来几乎全聚在伙房前了，似乎未曾举火，大家或坐或倚，集聚在麦草堆上等待。天快黑了，不知那位同学开头，唱了一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接着，大家跟着哼唱，当唱到「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哪，年迈的爹娘！」时，已经有人啜泣，坐在我旁边的王福成竟也泣不成声。

天已经全黑了，我不知自己想些什么，哭了没有，反正就在一片啜泣声中我蒙眬睡去。有人把我推醒，递了一个冷馒头给我，不是平常吃的杠子馍，我半醒半睡地咬了一口，啊！什么味道？就在这时她出现了！不是她的眼睛是她的声音：「不能扔！你忘了宝鸡吃馕面的那一大一小吗？仔细地把馒头皮剥掉，还是能吃的。」我完全醒了，

没有找到她的影子，但看见手上的馒头皮上有一层绿色，我翻来覆去地把皮慢慢剥了，吃下去仍然有饱足的感觉，谢谢她！谢谢天。

后来知道，那天晚餐所需的面粉前一天就没拨到，学校当局很辛苦地为我们四处调借粮食，借面粉已经缓不济急，才临时找馒头给我们，学校当局也不容易啊！我吃馒头之前，先仔细看看外皮，并剥去不洁部份，是那两、三天养成的。学校当局的苦心，不止表现借馒头上，为了我们这群形同有家归不得的学生，接下来的安排更看出对我们的爱护。

不到半个月，位于重庆海棠溪的警官学校，就专门派人到凤翔县我们学校贴布告招生，不久，空军官校也来招生了，我们班上有一位吴姓同学报考空军官校，居然没有考上。学校向我们宣布，凡是考上各类学校的，学校一律发给高中毕业证书，而且是用西安中正中学的名义和大印。

我怎么办？我发过誓，誓不当军人。陕西省当时有两个大学，一个在西安宝鸡中间的铁路线武功，叫「武功农学院」或「西北农学院」，根本没有理工学系，另一个在陕南，就是得越过秦岭，那儿的叫「西北大学」，是真正的大学。不管考那个学校，总得知道人家有些什么科系？何时报名，何时考试吧！这叫做「信息」，学校费尽了力气帮我们找免学费的军、警学校来招生，却未提供其它学习信息。我此刻

只是谈谈而已，学校即使提供了，以我只读到高三上的程度，也未必考得取。第二次空军官校来招生的时候，我也报名了，一个小学生亦即儿童的誓言何必当真呢？

第一项身体检查，就知道自己当不了飞行员。原来我已经有了近视眼，难怪上解析几何课时，总是看不清楚黑板上的粉笔字，总以为黑板没有擦干净。但他们允许我参加笔试，可能是我们学校的水平真地很差吧，报名了一大堆，只录取了约五、六人，包括我和王福成在内。负责口试的军官坐在教育长室里，空军制服和陆军制服不一样。他告诉我，可以读空军机械学校，同样是报效国家，我只有答应的份，王福成被指定读空军通讯学校。

当然我得先回宝鸡向爸妈报告此事。

父亲已经从兰州回到了宝鸡，脸上似乎还有尚未退尽的风霜。一个孩子年纪长大一些，他的父、母亲就会更老一点，此乃简单的逻辑，只是我去了凤翔十六个月，父亲苍老了的显然不止十六个月。父亲的第一句话问我：

「你确定知道是读军官学校？不是当士兵吗？」

我解释我们布告栏上说的是空军军官学校，而且下角上贴了一张报纸上登的招生广告。父亲立刻站起身来，握住我的手说：

「走，我们到社教馆门口看报去。」我发现父亲握我的那只左手

臂，竟有些颤抖。

报纸上当然没有空军招生广告，广告不是每天登的，那是十一月，也不是各学校登招生广告的季节。回家的路上父亲没有说话，如以前一样，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和父之间的关系向来如此，他就像个父亲那样，把养我、育我、教我当成他的责任，至于什么「爱」呀，甚至微弱到「关心」，都不会表现出来。

回到家里坐下，他问我想吃什么，，已经是记忆中的第一次，家里要吃什么，总是爸爸说了算数，怎么会问孩子？不过，他没等我回答就跟妈说：「吃饺子吧，猪肉韭菜馅的，我们也很久没吃了。」

然后父子两人对坐在那儿，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父亲竟然很快地把盯着我的目光移开，我又低下了头。很久，好像空气都凝结住了，父亲才开口说：

「你舅舅呀----」

我抬起头，他的话又止住了。幼时心中的爸爸不是这样的，他和朋友们喝酒聊天，说他当年在太原跟一个法国人学法文，并当场秀给朋友听，他很会说故事，也能惹朋友们哈哈大笑。为什么如今这样了？难道八年的劳苦奔波真能够夺走像我爸爸那种气概的男子汉志气？我等了很久，只好接着他的话说：

「我懂，我全懂。要不是舅舅发生不幸，或许我能在西安选个好

学校念，将来定能完成您的愿望，读到大学毕业。」父亲认真地听，而且在点头，可是他却把头偏了过去。我又接着说：「不过现在这样也好，空军军官是不一样的军人，我只要好好读书，将来好好干，说不定……。」

父亲骤然转回头面对我，他的脸好红，眼睛更红，眼泪噗噗而下，泣不成声地说：「可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千难舍万难舍，我还是拜别父母亲去空军报到了。

天下的父母亲们都会和子女离开的，父母亲们先去，算是老成凋谢，子女们先去就是悲剧。我是独子，我这一去形同永别，因为我们此后未再见面。他们晚年靠我妹妹，我那么早离开他们，他们等呀等呀的，我父亲等到七十八岁，母亲八十岁，我真希望他们相信台湾只有香蕉皮吃，他们的儿子早就死了。以免他们年纪越大，越为思念，思念那生死未卜的儿子而难以入睡。

对父、母亲的罪恶感，是千江水，万条河也洗不去的。我必须忍着昏花老眼的不便，把玛拉寇斯的事跟你说明白，就算是我赎罪的方式之一吧。

第十章 重庆铜梁旧市坝

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想要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大环境如同巨流，不仅仅是年轻人，即使像我父亲那样的成年、中年人，也都只能在巨流中翻滚，巨流里满是漩涡，被漩涡卷着，我最后还是成了职业军人。仅仅一年以前，我还允诺赵双桢成为工程师报效国家的！

我和王福成一块由西安乘军用飞机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又领了路费到铜梁县旧市坝入伍，凡是那一时期进入空军学校的，都在这儿受过洗礼。重庆附近大都是丘陵地形，凡是有一块较大平地的都叫「坝子」，常常成为乡镇或市场。旧市坝亦如此，中间的平地做为操场，围着平地几幢具四川特色的四合院，分别进驻每一「队」，只有第七、第八两队是在操场西边的草屋建筑里。不知怎样，我们政府总是舍不得盖象样一点的房子给军人住，不是征用民宅，就是搭草顶的临时建筑。

我们的正式称号是：「空军入伍生总队」，最高领导是「总队长」，总队长后来还到了台湾。每一队有「中队长」，我是机械第九期，在

第七中队，王福成被编入另一中队，到成都以后，听通信学校的同学辗转通知，知道王福成病死，算是不幸而早夭，他绝对是个满腔热血的陕西汉子。我们的入伍生总队分驻在各营房，没有正式的大门，且，有一条大约可容一辆大卡车通过的路跨越营区。当年规画旧市坝营区的人，在由铜梁县进入旧市坝的营区范围前竖立了两根柱子，分别刻着：

民族复兴路

空官第一关

同学们纷纷立在柱前拍照留念。很显然这十个字有两种意义，第一，要想成为空军男儿，此处是第一个考验，结训完毕时，还有不幸被淘汰的同学。第二，想要让我们中华民族复兴，必先要发展空军，没有空军，国家怎能不被欺凌？八年抗战时，日本飞机可以轰炸我们重庆，西安，宝鸡和其它各大城市，我们几曾轰炸过日本的东京，大阪？然则，把国家这样重大的基础建设，竟然如是简陋的规画。或许他们会说，回到杭州笕桥才是我们真正的培育空军基地，这儿，只能说是「逃难」罢了，也算对。

在我们操场的南边有一条小溪，下午出操完毕，便脱个净光跳入小溪中洗澡。小溪再过去，就是鼎鼎有名的大巴山了，「巴山夜雨涨秋池」应即指此山，山，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常常在队长的率领下，

沿着曲曲长长的石阶登上山去，沿途路旁有不少水池呈灰白色，去的次数多了，我知道里面浸泡的是竹子，待竹子被石灰等化学物质浸透，浸软，让竹子的纤维分离出来，便可以用为造纸原料，造成的纸叫做「火纸」，乃吸水烟袋不可少的。用火纸搓成的纸卷，自燃很慢，用嘴轻轻一吹，便成火焰，等于现在的「打火机」。五十岁以后，我也抽烟斗，烟丝，在买到可扭转式的打火机以前，常常想到四川的火纸，火纸可以从各角度点烟斗，且没有火柴刚刚画燃时的磷味儿。

我们登山时，常常看见从山顶下来的挑夫，这是川、云、贵一带特有的行业，他们头顶盘着白头巾，穿蓝布大挂，前摆掀起来别在腰间的宽布腰带间，足下跟我们一样穿着草鞋。他们用一条看来软软有弹性的竹制扁担，两端挑着体积很大，不是很重的火纸下山。扁担会随着下山的脚步一闪一闪地，想来，这是一个积累经验而成的节省力气的方法。

不知道多少年后，我看了丰子恺(1898-1975)的一幅水墨漫画，画中简洁的一阶一阶重庆式的丘陵石径，只有一位挑夫，仿佛也是挑着类似火纸那样体积很大的重物，挑夫孤独地行走在寂寞古道中，画纸上题了七个字：

一肩挑尽古今愁

我曾经对那幅画凝视了很久，此事应是发生在台湾，且是到了台

湾多年以后，又是大陆探亲开放多年以前，那画，竟然触动了我的乡愁，想到了旧市坝，又想到了宝鸡凤翔，还想到了离别父亲时，父亲的眼泪。

入伍训练的内容乏善可陈。约为三、四个月后，民国三十五年年初，我再次遇见了她，你为什么还要问她是谁？我不是说过我已经和她见过三次面了吗？我和同学张春翔一同被选为我们队上的「中山室委员」，任务是领了公费到铜梁县城去采购文康书报，那得走很远的路，中午用误餐费吃饭，晚餐前赶回队部。张春翔也很有趣，他父亲在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附近开一家杂货店，学生和老师们是他父亲的基本客户，且，他自己也决定民国三十三年高中毕业后要考音乐学院的，没想到三十三年初就被炸了，日本飞机主要目标是音乐学院，没想到炸偏了，整个铺子遭殃。他乃考了空军，想必是要驾飞机到日本把冤仇报回来，大约和我一样身体检查没有通过才改学机械的。他从空军机校毕业后分发上海江湾机场，到台湾不久就申请退役，约为民国五十九年，张春翔已经是三重一家农具生产工厂的老板，此是后话。

那时，我们一块走路到铜梁，他仍一口四川乡音，也很直率。有自行车从我们身边轱过，他会一直盯着车子看，一直到车子转了弯不见踪影，他才用四川乡音赞叹说：「洋马儿跑地好快哦！」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张春翔很随和，买什么书都由我说了算，钱有限，也没买到

什么象样的书，倒是报纸，说是要给队上订一份日报。那时好像有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但我一眼就看中了头版上登着一幅陌生照片的「新华日报」，照片上的是毛泽东，张春翔说订这个报纸不好吧？我说可以啦。我们就订了一份，后来知道那是在大后方唯一的共产党机关报。想来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委员长讨论中国战后的重建问题吧，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是在讨论如何分赃的问题才对。做为胜利国，敌人除了扫地回他们自己老窝之外，留下来的就只能任人宰割了，国民政府对这事有一个专门用语：「接收」，负责这种工作的人称为：「接收大员」，个个都是肥缺。老共那方面怎么称呼不得而知。

从铜梁回来的路显得比去时远多了，我们找到路边一处小山坡上，斜躺着晒太阳，重庆冬日的阳光真舒服，自小生活在北方的我，几乎要被那可爱的阳光熏醉了。就在蒙眬的片刻，她飘然出现，她长大了些，可她的双眸仍有童稚的纯真，她对我露齿而笑地说：

「那人，你喜欢吗？」

我们之间似乎有那种被称为「灵犀」的默契，我立即知道她问的是什么人，因而立即回答说：「我喜欢，一看就喜欢了。他慈悲宽厚，他会爱护我们的人民，把大人小孩带到天天过年的美好世界去。」

「你说对了！」她又飘然而去。

如果我现在接着说，我跟她算是有缘份，可是，我跟她的缘份不

如我跟美国的多。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什么对什么呀？未免扯得太离谱了吧？一个是人，一个是国家，什么缘份不缘份的？其实没有扯太远，因为我的第一份职业——气象员就是因美国而获得的。

我原本入伍训练之初，是空军机校第九期正科学生，入伍训练之后会到成都的空军机校继续学业，这话应提早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号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事变说起，珍珠港事变最少最少也改变了我的第一个职业，由空军机械员变成空军气象员。珍珠港事变以前，美国不愿意蹚中日战争这浑水，可是之后不得和日本宣战，也不得不帮助岌岌可危的中国。并派了「空军志愿军」，其实都是职业的空军飞行员到中国来，这就是后来的「飞虎航空队」。他们到了昆明，发现中国的所谓「空军」，只有几架苏联援助的旧飞机，要命的是各地区的天气报告都不全，不知道目的地的天气，让飞机如何飞。我们的空军当局，那时尚未成「军」，只称为航空委员会，乃急起直追，立即在当时的昆明军官学校拨出一部份学生加以六个月的快速训练，即派往各地督导气候测报工作，不要求他们「预测」天气，只求按时、准时地把当地天气现况报告出来即行，此即我们气象第一期的学长，我，则是第八期，且专业训练时间已延长为一年六个月。

先到旧市坝的气象科同学不足十人，编在我们机械队上，因人数不足无法开班，这十人中有两人是北平人，看在同乡份上极力说服我

转行加入他们。这事我想了很久，无论是机械还是气象，上面都有个「空军」的冠词加在上面，都有违我反对当军人的原则，只是觉得「天气」这个字，比「机械」的想象空间大多了，机械不管怎么想也离不开飞机，天气则海阔天空，于是答应了他们签字改行。不久，我的两位同乡就发现我是多余的了，因为立即有从南京和汉口两地招来的一百二十多个新生来旧市埧报到，再加上原有的十来人和我，使气象第八期的人数超过一百三十人，成了旧市埧人数最多的一队，我们编入第九队，队部在操场西北角上的一处四合院，和四合院紧邻的是一处低矮的农宅，说不定他们才是原来四合院的主人，他们经营四周的水田栽育水稻，也兼营养猪，也兼卖点四川特产的麦芽糖，芝麻杆儿，我是他们的主顾之一。

所谓的人伍训练，大概自从袁世凯在小站练「新军」以来，大抵均相同吧，无非是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然后是更为无聊的整理内务，把棉被压成豆腐干模样。这那是想训练勇敢军人？多半是怀着想把我们弄成白痴，好听任他们摆布的鬼胎。因此，我们若用「快跑」方式倒看这一段录像带，则除了几个我被处罚两腿半分弯，并头顶棉被，或被罚俯立挺身二十下几个镜头之外简直没啥可看，倒是有两个有关于「吃」的镜头，值得停格下来让你观赏一下。

事情均发生在我们到大足旅行时，我当时并不知道大足的佛像石

雕群是仅次于龙门、云岗、和敦煌的中国第四大摩崖石刻，我是名实相符地走马看花。反而是一个中年和尚吃饭的镜头吸引住了我，镜头为什么至今仍深印在我心上，我也说不上来。我们是单排行军，一面在小路上前进，一面看右手边从大山巨石劈雕而成的站、立、坐、卧等姿态各有不同的佛像，就是在这时候，那个正要吃饭的和尚把我的目光从佛像上吸引到他身上去。

他，那位至今犹未忘记的和尚，他，露天盘坐在小路偏低处一座平坦石头上，他并没有双手合什或祈祷、感谢什么的，他，只是坐在那儿，面前一大碗刚煮成的白米饭，因为旁边只有一小碟红色辣豆瓣为菜，因此显得那碗饭特别的白，看着看着，他就以左手端起了大饭碗，右手用筷子扒一大口入嘴去咀嚼，这才以筷子蘸点辣酱伸入嘴里吸吮，且他根本没有注意甚或感觉出他的上面有一个长长行列的军人，正在经过且在看他。后来许多年，我看了日本铃木大拙写的一系列有关禅的著作，也看了不少我们台湾出版的有关禅宗顿悟的故事，那些得道大师修成正果的过程，全都是心传心，无法用语言或文字来表达的。我正是如此，我无法告诉你那个专心吃饭的和尚，为什么会让我记忆到今天，至于说他让我悟得了什么，似乎更夸张了。总之，我一定痴立了很久，被后面的同学大声提醒，我才，我后面的同学也是，用小跑步跟上了前面的队伍，原来我们已经比人家落后三十

公尺远了，想想，人家游了名胜古迹感怀必多，而我只记得一个和尚吃饭，真是俗得可憎。

第二个值得你倒带一看的镜头，也是和吃有点关系，但并不完全是吃。四川省大足县有一位退休的将军，应该是我们教科书上所称的「军阀」，比周效栋的爸爸阶级高了许多，年纪也大了很多。每次有旧市坝的空军入伍生到大足县旅行，一律由他作东请全体同学们到他府上吃饭，吃的是酒席，无酒，但有拚盘，四小炒，四大菜，甜点。吃的当然值得一记，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的「训话」，队伍排成凹字形，就在他们家的前院天井，足见他的住宅有多大，他，由一位类似于副官的人陪着，均穿便服在我们面对的门前出现，队长大声下口令喊：「立正」，然后用标准的军人动作转身，并向前小跑几步，再立正，行举手礼，等他回礼了，队长才大声说：「恭请司令训话。」

他的训话自然了无新意，无非是中国被列强欺凌了近一百年，未来的发奋图强，便仰仗你们空军了。我后来看了类如「传记文学」那等杂志，知道「军阀」们之中，也有真正爱国，胸襟开阔并以清廉自许。眼前这一位，似乎在下野之前，并没有忘记为自己存足够的金钱，在家乡盖一幢享用终生的大宅院。

吃了人家的饭，但我没有记住他的姓名，我们台湾仍有许多在旧市坝受过洗礼的退休空军，或许他们之中有人记得这位将军，三、四

年之后大陆就风云变色了，他还能保有他的房产、财产，甚至于身家性命吗？

旧市坝的经验只让我体认到一件事，即，无论何国、何处的军人，无论胸前排满了多少勋章，表面上多么令人敬畏，其实这等人只有一个出身----入伍训练。要先扮演傻瓜，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最好是如同没有思想的木偶，踢正步前进时，不能被视为一群人，要如同一排一排的木偶。扮演傻瓜成功了，才配称为一名军人，我很缴幸地也伪装成功。

入伍训练完毕，乘上军用大卡车，由旧市坝上车，路经遂宁县住一夜，再经乐山县，于次日下午到了成都校本部。我们如同一批货物，旧市坝的长官把我们排成凹字形，报数，计量，连同名册一并缴交成都校本部。

第十一章 受洗礼的大都市

以二十世纪大部份的岁月来说，中国人只要是读了些书的，都不免要接受或美国或苏联的洗礼，胡适博士很小很早就受美国洗礼了，我则自成都始。

我们学校在一条飞机跑道旁边，跑道叫凤凰山机场，原为二战时的美国空军基地之一，我们去时美军已去，于是把房子让给我们学校当校舍。图书室里还剩下许多英文的口袋书以及 True Story 之类的杂志，同学们之中大约只有李毓霖看得懂。

美军虽然走了，仍留下两个美国人，一个上尉一个士官，他们每天在实习气象台中工作，学校当局也未曾想到让他们来给我们上英语会话的课程。两个全是白人，上尉的个子奇矮，船形帽挂在腰带上，我总觉得他应该把帽子戴上才象样一点，他头全秃，只剩下两只耳朵上面还有些头发，这也罢了，可他偏偏要把两旁的头发用发油硬梳到头顶上去，我由他身旁经过，低头看他油亮的头顶和几络贴着的黄毛，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那士官倒还像是电影中的美国人，偶然在厕所中会碰见他。我们的厕所是一个池子，前面有水泥台，大家站在台上小便，两节课间休息的时间不多，便池台上常常是排成一排的。若是美国士官在小便，便占用很多时间，他小便完了，犹在用力摔他那玩艺儿，是有什么毛病？还是有意想对我们中国人炫耀些什么呢？其实他的那一根也不怎么样。

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可是李毓霖不同。李毓霖是江苏吴县人，就是如今所称的苏州，他是真正的苏州高中毕业的，那可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中学。他很自然地和美国军官谈天，慢慢地就可以到实习气象台去串门子了。进入学校后不久，李毓霖突然叫我去气象台，说是要给我看一样东西，好在洋人不在，我就跟他进去了。

他带我到一个很大的斜方桌前，那是后来我们画了一辈子的天气图，他指着桌上铺着的一张天气图让我看。那是我看过的最棒的洋纸，在中国战区当然是用东亚地图做天气图的背景，上面的海洋、陆地、山脉、河流，甚至中国各省的位置都有标示。学气象的好处之一是天天看地图，所以对各国家、省市的相关位置都有清楚的概念。李毓霖指着中国东北部的那一块问我，那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废话吗，「东三省，现在改为东北九省了，这是考我吗？」我没好气地回答他。「你

看，他们怎么写？」他指着一行英文字问，他明明在讽刺我的英文程度吗，「我怎么认识！」

原来，李毓霖真正的目的是告诉我，他们「老美」（他向来是这么称呼美国人的）把东北标示为「满州」，新疆标示为「东土耳其斯坦」，西藏和外蒙古更不用说，早就画在中国之外了。

很多年后，我曾经有意把李毓霖和我之间，既矛盾又友好的关系，写成一篇约三万字左右类似于回忆，又有小说形式的文字，腹稿都有了，但是立刻就想到，即使写出来了，到那儿发表呢？开放大陆探亲以后，知道李毓霖早在十一年前，即被打成右派瘦死狱中。

时代的巨轮转动到某一时空的坐标交会点时，就会鼓动两批想法不同的人，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中国古代的大臣们有为了争皇帝该立何者为太子一事，不但争，且有以身相殉的。我和李毓霖包括旧市坝在内，前后同学了两年半，旧市坝排队时是同一班，成都教室内前后排，那正是我强说愁滋味的年龄，把自己在虢镇碰上的枪杀逃兵、宝鸡冻死的乞丐都告诉了他，对这些他都愿意且耐心地听，每次他的结论多半是：「国民党政府的确十分可恨。」

只是，葵花的事，我一字未提，葵花应该属于我，我一个人，无法与任何人分享。

李毓霖想教导我一些什么，可惜我这个来自于凤翔、宝鸡身上沾

满泥土味的青年人，到了成都犹如到了----纵然不能说是美国，最少离美国很近了。他的教导完全听不进去，因为整个的成都市都为美国疯狂了。

到成都的第一个假日我即去了城里，来和去都得步行一个半小时，而我是每逢节假日必去，因为我迷上了美国电影。最热闹的春熙路上，两旁商店卖的是原子笔、原子袜、原子雨衣，偶然有美国大兵走过，必搂着中国姑娘，街上的中国人会伸出大姆指说：「顶好！顶豪！」

美国电影也真的好看，彩色的叫做「新艺综合体」，电影看多了，自然会得出一些结论。知道他们出出入入都开漂亮的小汽车，美女们尤其爱开敞篷车，美国人无忧无虑，每天不是唱歌便是跳舞，白人、黑人同样幸福，黑人露着特白的牙齿唱歌，歌声低沈而动听。他们有吃不完的奶油蛋糕，上面有厚厚的一层白色奶油，很少看他们吃，大约是吃腻了，他们的蛋糕是用来砸人脸庞或砸我们学校那位上尉的光头，用以逗趣观众的。

每当星期日夜晚，我们从城里回来看了美国电影的同学，必会在寝室兴奋地讨论，或赞扬片中的故事或男女主角，几乎每一次到最后，一间寝室怕有三十人左右吧，都被李毓霖喝止，说是打扰了别人睡眠，大家都会自动停止，有话也只能留到白天再说。大家并非怕他，说老

实话，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人得罪不得。但我还是把他得罪了，且连续一个月，我们彼此没有说过一句话。缘由是我买了一双美国大兵皮鞋，当然是二手货，是学校一位学长推销，说是我的脚够大，特别卖给我的。美国鞋，尽管是二手货，绝对是真正的美国牛皮做的，穿在脚上自然虎虎生风，免不了会有点洋洋得意吧，李毓霖问我花了多少钱，我如实回答他，他只冷冷地回了一句：

「连美国的屁也是香的！」

这事能善了吗？顾不得其它，我一拳挥了过去，没有打中他，被同学们拉开，此后我们彼此没有再说过一句话。直到下一次又考「动力气象学」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前一排，敲敲他的背：「第四题」，很快，他便伸左手递过来，再敲敲，「第七题」……这些答案我抄了之后，很快由旁边同学抄，再向前传，很可能最后流向了第一排，这样的同学怎么能不讲话。

李毓霖推介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大众哲学」，署名「艾思奇」的作者着，文字浅显易懂，谈些由量变到质之类的内容，那时的我渴望知道一些「哲学」，是属于生命之类那种抽象的，「大众哲学」中没有，不过我也未察觉出大众哲学的论点，和看美国电影，穿美国大兵皮鞋之间，有什么矛盾。他推介我的第二本书很薄，叫做「新经济理论大纲」或类似的题目，我也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那本书犯了一般谈

经济学的通病，喜欢用一个或更多的术语，解释另一个难懂的专用名词，还他书时直接告诉他，我看不懂，到今天仍然不喜欢看谈经济学的书，或评论等短文，依旧是因为看不懂。

他也推介我看了一部苏联影片叫「宝石花」，彩色的，故事内容忘了，结尾也差不多是大团圆式的男女主角相聚一起。他等我回来，迫不及待地找一处草地坐下，问我的观后感，其实是他急着要说出他自己的观后感。他难得热情地说：

「你看，人家苏联拍的电影多棒，彩色好，故事好，女主角漂亮，美国片跟人家一比，算个什么。」

那部「宝石花」电影真地不怎么样，大约是一个由俄罗斯民间故事改编的，结尾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宝石花开了，男女主角终于能够再相拥抱。彩色较之于「出水芙蓉」逊多，而且剧情沉闷，那像美国片那样歌舞飞扬。他显然希望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我立刻找到了他的弱点，对他展开诘问，我说：

「你不是说苏联方面信仰唯物论的吗？」

「当然。」

「那为什么片子结尾时，因为女主角的一片痴情，竟然使宝石开花了，岂不太唯神一点了吗？」

「不是唯神、唯物的二份法，有了信仰且认真实行了，宝石就会

有开花的一天。」

「李毓霖，我觉得宝石花真地不如美国片好看，你的话已经艰深到跟新经济理论一样，我听不懂。我只觉得美国片热闹，更轻松……」

「那是因为你中毒太深，我发现你和那些家伙一样，盲目地喜爱美国。我告诉你，美国文化是有毒的，你知道吗？你们现在简直把美国文化当做一种宗教般地信仰，膜拜，你们的民族自尊心到那儿去了？我看你，你不过也只是有点小资式的同情心，根本不懂得把同情心化为思想力量。」

他的话越听越难懂，我站起身回了他一句：「我说不过你，总之，我信的是美国教，你信的是苏联教，这可以了吧？」

毕业之后，我们大家都立刻知道，有一位姓张的同学，才是真正的潜伏在我们中的共产党，张姓同学没有到被派往的机场报到，便直接消失了。他如今在南京的干休所养老，而李毓霖只能说是那方面的书看多了，私心仰慕而已，而李毓霖却墓木已拱！

其实，那时的成都也不像我前述的那么「美国化」，我们学校每天买菜和在铜梁一样，得去「赶场」，即每天到不同的邻近乡镇买菜。我便是于担任「采买」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野台表演的川剧，且领会出川剧的特色是他们的「和音」，文武场充当「和音天使」，明显地加强了戏剧的张力和气氛。

成都第二条热闹的道路叫「祠堂街」，好像杜甫的故居在那儿，大部份的书店也在祠堂街。我在成都的「正中书局」买过一本「唐诗宋词选」，是叶楚傖(1886-1946)编注的。三十多年后，我在台北正中书局编审部找到退役后的第一份工作，没想到那本书仍放在架上卖，只未察是第几版了，那本书也历经沧桑了吧？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我们算是正式毕业了，我也算是结束了这一生的学校教育。人家说，一个人的一生中要接受三种不同的教育，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显然我的学校教育不足，对我们学校来说，我不是一名好学生，对李毓霖的劝解教导来说，我更是愚钝不堪。匆匆告别了成都，其实成都的趣事、杂事、韵事都多，但我急着要去北平。我分发到北平，北平是我离别了十三年的故乡，那儿还有我的祖父、伯父、叔父。李毓霖被派到重庆白市驿机场，约为三十七年年底，他就弃职回到苏州老家等待解放军渡江了。

告别了，成都，告别了，李毓霖。从此我再未回成都去过，听说成都如今更为繁荣热闹了，想必可乐、麦当劳汉堡相继出现，比我在成都的时代，更为美国化。

李毓霖呢？未知他留下子女否？

第十二章 爷爷的故事

和我一块被派往北平南苑机场的，是李毓霖最讨厌的一位同学，李毓麟叫他「小资」，他真正的名字是汤斌，天津人，个子中等，只是鼻梁处好像被打了一拳似地瘪了下去，令人一见难忘。

早在铜梁入伍训练时，他即在我们中间出类拔萃了。因为他完全实现了「抬头挺胸」的口号要求，且他的胸肌发达，那时我们常常是打赤膊做体操，他有很多机会展示他的胸肌，有一次还被队长点名到我们凹字形的队伍中间，示范我们说：「做一名军人就要像汤斌这样，抬头挺胸……」

到了成都以后，无法再以胸肌出人头地，而汤斌依旧有办法显示出他的优秀。例如，他是首先向我们学校美军士官搭讪的，对方好像听不懂他的英国话，且似乎也无意要跟他学中国话，因而他和美军士官的「友谊」没有继续下去。

为什么李毓麟叫汤斌「小资」不知其详，小资是小资产阶级的简称，相对于贵族和无产阶级来说，李毓霖更鄙视小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汤斌是我们同学中肯上进的人，到台湾以后，他是同期同学第一位考取留美三个月受训的幸运儿。退役后不知怎样就全家去美国了，

如今住在美国东部，很少回来参加同学会，有人说他开了一家杂货店，被抢劫过好几次。

总之我和汤斌一块由成都动身，先坐飞机到汉口，住一晚空军新生社，次日晨才飞南京。到汉口的当天下午，我想去黄鹤楼一游，因为「昔人已乘黄鹤去」那首七言绝句太有名了，他呢，他说他想去汉口的租界区去看看「异国情调」，我觉得他的想法简直匪夷所思，我们为此争议很久，最后我终于冒出了一句：「怪不得李毓霖叫你小资，你实在很自私！」这才答应了我去黄鹤楼，但交换条件是到了基地正式工作后，不准再叫他「小资」。

从汉口到了南京，也是在新生社住一夜，等次日上午去北平的飞机。我这一生第一次喝可口可乐是在南京，小资汤斌推荐的。我们在新街口一带逛街，我想买一条南京有名的金华火腿带到北平孝敬爷爷，在一处地摊旁边，只听见汤斌大叫了一声：「可口可乐！」

我以为他看见熟人打招呼了，循着他的目光到了地摊上，猜想是专门卖由美军 PX 流入市面之商品的，有巧克力、高露洁牙膏之类。那时尚无易拉罐，只见他问了价钱，急忙命人家开了瓶。我看过台湾的影片「苹果的滋味」，男女主角均为很好的演员，但令我难忘的是那个男孩子，男主角说不用带回家拜拜了，就在医院的病床旁边，全家每个人分了一个苹果，导演明显地要告诉观众，这是他们一家四、

五人第一次尝到苹果的滋味。男女主角怎么吃他们的第一口苹果镜头忘了，但其中扮男童的那位小演员，对着苹果一口咬下去，脸上的表情配合上嘴里笨拙的咀嚼动作，使我立刻热泪盈眶，难道我们台湾人在美国苹果的引诱下，竟那样地全无抗拒能力吗？后来，看张艺谋导的「一个也不能少」，影片中也有孩子们第一次喝可口可乐的镜头，若论及抓面部特写的功力，「苹果的滋味」高明多了。

我真正想说的是汤斌喝可乐的表情，他右手持瓶，头部偏右向上抬高，瓶口对着嘴，颇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架式，第一口饮下去，仿佛他的塌鼻子变高了，发出吱吱的声音，这才回过头来对我说：「好，好喝，老冯你也来一瓶。」我幼时偷喝过凤翔高粱，在成都又喝了绵竹大曲，不知道可乐是否比前两者更好喝？问了价钱知道并非离谱地高，也开一瓶喝了。是汽水的味道，甜的，不难喝，也说不上怎么好喝。我迄今仍纳闷，它究竟有什么魅力，让地球上超过十万人以喝不到美国的可口可乐为憾事？而，这十亿人究竟是真地想喝可乐，抑或是响往美国式的生活呢？

我们在喝过可乐之后的第二天，就乘飞机直奔阔别十三年的故乡北平了。

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在每一个人的感官世界里都有或长或大的变化，用不着深奥的相对论解释。当我拎着皮箱和一只火腿乘三轮车

在我们家门口下车时，发觉大门小得多了，会不会我找错地方？我试着敲了两下门环，一位中年妇人出来应门，我还问：「请问这是冯宅吗？」对方抢着回答：「大年回来了！你爸爸才来过信，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原来她就是我伯母，北平话叫大妈，想必，漫长的十三年我还没有大改变，然则北平的家，变化太多了。

北平的家比记忆中的小，我离家时大妈没有小孩；我是父亲三兄弟中唯一的孩子，现在大妈有三个小孩了。祖母在抗战时去世，这我早知道，我爷爷还很健康，大声地叫着我的小名，嘱大妈立刻替我沏茶。房子小多了，那间客室怎么看，都不像我小时候跑来跑去地那么宽敞。我三叔没有和爷爷同住，剩下的一间房子，租给在胡同口开锅贴店的夫妇俩和小孩住，因而我只好和爷爷同住一间房子了。

和汤斌约好，他回天津家里，我在北平家里，各自放假一星期，然后再一同去南苑机场报到。有机会和爷爷同住一室，爷爷爱说话，我爱提问题，我们常常聊到半夜，听爷爷一面说故事，一面发出鼾声，这才不得不停止。

大约每一个人的爷爷，都有一段甚至很多段故事，但是我深信我爷爷的故事最为精采。我爷爷历经民国二十六年底，日本人占领北平，更远的冯玉祥、张作霖入北京，袁世凯称帝，八国联军入北京等，当我问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情时，爷爷说：「那一年我刚出生，

怎么知道？」并补充说：「你为什么净问这些惹人生气的事，不讲讲贞观之治啦，大唐盛世之类的。」我爷爷的结论是：「我这辈子所见到的，也净是这些让人不顺心的事儿，把北京改成北平，就毫无道理！」爷爷未曾料到，只要再等个一年多，他们可以亲眼看见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且北平也改成北京，再度成为中国的首都。

爷爷回答问题总喜欢岔出题外，那时他老人家高寿七十七岁，记忆力可能衰退了些。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北京城，以为北京城不但是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东牵西挂的人、事、物非常多，其中有些片段十分精采，连我，都忘了当初问的是什么，竟听入了迷接着问：

「那后来呢？」许多我爷爷说过的故事都足以记下来，用不着加油添醋就是可读性很高的故事，可惜我不是小说家。

爷爷享年八十六岁，这当然是探亲以后才知道的。如果说我爷爷是生于忧患，但他去世时，毛泽东的政绩上能令全国人民满意，也应能令他老人家满意，然，他老人家去世以后的岁月，就不堪回首了。

我在北平给自己放假的一周之中，自然也去了故宫、天坛、北海、中央图书馆、天桥和颐和园等处，颐和园色彩俗丽，一进大门，右手万寿山，中间昆明湖，远处是长桥，像一幅镶了框的玻璃油漆画。万万没有想到，我离开北平那天，最让我感动且难忘的竟然是颐和园，

此事容稍后再说。

我和小资汤斌会合后去机场报到，开始了我延续二十二年的空军气象员工作。汤斌由天津回来，他买了一顶美军用的船型帽，代替我们那时所戴的大盘帽，我说，你戴这样的帽子，人家机场的卫兵会让你进去吗？没想到，不但让他进去了，还特别向他而不是我行了举手礼。

我们的工作提供飞行人员所需要的天气数据，南苑机场是战斗机基地，有一个或两个中队的 P-51 型战斗机，它们每天挂弹、加油、起飞、落地，因为当时国共内战正处于关键时期，共方完全没有空军或防空武力，我们的战斗机便挂了炸弹加装子弹，轰炸扫射兼用。到台湾后约民国五十年左右，我在台中清泉岗基地服务，认识了一位好友姓张，民国三十七年时他在西安机场，也是飞 P-51 型战斗的。他告诉我当时出任务的情况，出发前先有一次简报，说明该次任务的目的地敌情、天气等，当时都是目视飞行，云幕低、能见度差就不起飞或起飞了半途折回。到了战场上他们倒是十分轻松，有时对着几辆卡车丢弹，若是车上有共军逃出车外，他们便扫射，至于像电影中所演的如蝼蚁一般多的敌人，他们还未曾见过。我问他：「杀了人，你心里不难受吗？」他说：「我们称之为出任务，根本没有想过你所谓的杀人问题，而且每次任务回来都要作『战报』，就是说炸了多少辆车

子，射死多少名敌人之类的。不过，我们每一次都会夸大一些战果。有时到了目的地，连敌人的影子都看不到，机上的炸弹和子弹总不能带回去吧，所以就胡乱丢他一通，射它一通了。」你听听这话！万一伤了老百姓怎么办？是不是全世界的军人都是这样作战的呢？

容我再说一遍，是否全世界的军人作战时，都不顾及平民的生活、生命呢？

我在南苑机场只待了四个多月，十一月十三日上午突然接到台长的命令，叫我和汤斌两人回宿舍整理行李。中午吃了午饭，就有一辆中吉甫车载我们进城，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气象大部队报到。气象大部队是在原德国领事馆，里面有抽水马桶，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有浴缸设备但坏了且无热水。长官告诉我们，我们是「见习官」，对于「作战」的帮助不大，因此先把我们疏散到南京待命，说是第二天的飞机，当夜就在大部队打地铺睡了。

我们家在西交民巷附近，距离不远。我便走回家里，跟爷爷和伯父伯母说，我暂时疏散到南京，等些日子还会回来，这不是说谎，心里确是这样想。我爷爷还要带我去前门外三庆戏园厅李多奎的「打龙袍」，我说，等回来以后再说吧，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和爷爷告别，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其它。

第二天是十一月十四日，尽管事隔快一个甲子了，我仍然记得那

天确实是十一月十四日。一早起来，外面是一片白色，原来昨夜下了大雪，我们没有冬衣，只穿了卡奇布衣裤，有一件成都买的皮加克御寒。又是一辆中吉甫车，连同我来时的小皮箱外加行李卷，我们约有五、六个人，大约全是「作战」不需要的军官吧，一车便把我们送往西苑机场了。我坐在后面，一路不停地向外看，盖上厚厚一层白雪的北平城突然变得严肃而且寂寥了。故宫、中山公园都由车外画过，出了西直门，很快地远远看见万寿山，一片雪白如梦如幻，色彩鲜明的万寿山在白色的托衬中，犹幻景般的出现。

说到这儿，不知如何会想起红楼梦的一个镜头，贾政在满天铺地的白雪中，接受披着猩红斗篷的宝玉来到身前一拜，这，与我离开北平或北京有什么关联吗？

北京那时城墙仍在，亦无一环二环三环等高架道路，事实上我也未曾下拜，甚至没有告别的想头，可是一年之后我在何处？我在淡水。四十年之后我在何处？我仍然在台湾，一直到今天。贾宝玉拜别的，除了他的父亲，还有他锦衣玉食、怜香惜玉的生活。我呢，我不像贾宝玉那么自觉自发地一拜，但我确实是告别了什么，绝不仅仅是我的家、我的故乡、我的故国，我的.....

我的下一个逆旅是广州，我在那儿又待了十个月。